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四期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五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5a)

【本刊专稿】	“青铜峡事件”述略——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一	余汝信
【深度思考】	“9 1 3 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	袁策祥
【回首文革】	席卷画坛的“文革”风暴	吴继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青铜峡事件”述略
——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一

• 余汝信 •

洗恒汉（1911—1991）文革初是兰州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兼）。文革中经周恩来提议“而洗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确的，故以洗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1）。虽甘肃最终未有军管，惟洗自此即主持兰州军区辖内陕、甘、宁、青四省区“三支两军”工作，一时有“西北王”之戏称。

文革结束后，洗因“犯错误”于1977年6月被免除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1982年12月被令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85年6月改按正军职待遇）。洗自觉甚冤而申诉无门，惟有诉诸于文字，生前完成了回忆录《风雨八十载》，去年中，连载于其女儿洗玲的博客上。《风雨八十载》第二部分“文革十年”，由于发表在互联网上而免却了“组织上”的审查删改关，对西北文革内幕有较深入的披露，值得一读。

《风雨八十载》提及洗恒汉亲身处理过的“赵永夫事件”、“青铜峡事件”和“钱信莎事件”。因洗并非在这些事件的第一现场，叙述中难免有未及详尽或与事实略有出入之处，窃以为对这

几个事件尚可作些补正。本文先讨论“青铜峡事件”。

一、1967年1—8月的宁夏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刮起了一场夺权风暴。1月25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22个群众组织在《宁夏日报》发表《紧急通知》，声称于当日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并决定于1月27日夺取宁夏党政财文大权〔2〕。

1月26日夜，“联委会”几个头头到宁夏军区，要求军区予以支持，并派一名领导干部参加夺权后的领导机构。军区司令员朱声达等经紧急研究，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发报请示，未得答复，遂仓促表态支持“联委会”夺权，并派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夺权领导机构。

1月27日，“联委会”如期夺取了宁夏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还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宁夏各市、县、各单位相继夺权。

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2·11”声明，撤销对“联委会”和“1·27夺权”的支持。同日，对《宁夏日报》社实行军管，将《宁夏日报》改名《红色电讯》，停发宁夏地方稿件，只转发中央报刊的稿件。此后，对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公检法机关、农建十三师等也实行了军管。

3月12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3月10日成立的保守派组织“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

3月18日，坚决反对宁夏军区“2·11”声明的宁夏全区性造反派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

及后，一些既不支持“筹备处”又反对“总指挥部”的群众，分别成立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宁总司”）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

6月19日，宁夏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

7月26日，“筹备处”更名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仍简称“筹备处”）。

8月1日，“总指挥部”调集石嘴山工人造反组织等攻打“筹备处”所在地银川西塔，将“筹备处”赶出银川。

8月8日，“总指挥部”、“筹备处”两派在永宁县大观桥发生大规模枪战，武斗进一步升级。随后又在永宁、吴忠、掌政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

自7月下旬，朱声达亲赴兰州向军区党委汇报。据朱称，冼恒汉拒不接见他，8月8日永宁武斗后，冼说是“朱声达开了枪”。次日，朱从兰州返回银川，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革情况。经中央同意，决定8月14日派飞机将宁夏军区主要领导接到北京（兰州军区及冼本人对宁夏军区及朱声达的态度，冼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

此际，宁夏已形成四派群众组织互斗、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二、62师奉命赴宁支左

8月12日，鉴于宁夏军区对宁夏文革的局面已失去控制，中共中央今日指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8037、8119部队，接替宁夏军区负责的宁夏“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8037部队副部队长）为副组长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北京的指示，8037、8119部队当即表态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并于18日以宁夏军区的名义，发表支持“总指挥部”，撤销对“筹备处”支持的声明。

8037部队，是陆军第62师的代号。该师1958年8月随21军从朝鲜撤军回国后，隶属于北京军区。1959年3月中旬，从山西晋南地区移驻甘肃临夏，配属兰州军区，执行平叛作战任务。1960年11月，正式脱离北京军区建制，隶属兰州军区。同年12月，第62师184团等与第61师181团等互调换建制。其时，兰州军区虽名为大军区，惟仅辖有第55师、第62师、炮兵第15师和骑兵第2师共四个师，并无军一级建制的野战部队，这种情形，直至文革初期并未有改变。

至文革初期，陆军第62师辖有步兵第181团（代号8046部队）、第185团（代号8047部队）、186团（代号8048部队）及炮兵第242团（代号8050部队）共四个团。师部驻甘肃平凉市，181团驻平凉四十里铺和泾川，185团驻宁夏青铜峡，186团驻宁夏固原，炮兵242团驻平凉八里桥〔3〕。

1967年2月，陆军第21军由北京军区转隶兰州军区建制。3月，陆军第62师归建第21军。其时，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徐洪学是该师副师长。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徐当时是师长，不确，徐迟至1968年5月方接替姜玉安任师长。姜玉安后升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后改任正军职的第一副司令员）、顾问组长；李天冲参与宁夏革委会筹备工作，后任宁夏革委会常委，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宁夏军区副政委；徐洪学文革中在宁夏名气颇大，历任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宁夏驻军支左小组组长，1969年10月后任陆军第21军参谋长、副军长。

1967年8月12日，陆军第62师奉命赴宁，基本部署为：师部带185团进驻银川市，186团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炮兵242团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担负“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保护左派”任务（181团于1967年初已赴兰州市担负支左任务）。该师前指于12日18时进抵银川，185团、炮兵242团随后的移防亦称顺利，惟186团进驻途中受阻。

三、186团受阻与开枪

时步兵186团团团长王林，政委许昌其。多年以后，许昌其向笔者述说了该团在青铜峡地区受阻与开枪的经过〔4〕。

许说：“在驻固原期间，186团原倾向于保守派‘筹备处’。师里通知我团，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要转观点，支持造反派‘总指挥部’。团主要领导一时转不过弯来，全团上下也转不过弯，但通知下来，只得执行。”

“8月中，我团奉命由固原进驻吴忠支左。开始去了两个营，一个营留守固原。当部队行进至离吴忠约二十公里处时，被保守派‘筹备处’围住，不能前进。保守派听到风声，说我们到吴忠是支持‘总指挥部’的，‘筹备处’发动支持他们一派的农民，睡在公路上，我们整整一

天都前进不了。请示师里，师里也不回电话，到晚上，派团副参谋长和保守派谈判，未有结果。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好因事经过此地，要他再请示师里，亦无回音，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能动武。”

“被围困的地方，叫高米子湾，是一公路岔口，离青铜峡大坝下的185团团部驻地约七八公里。185团主力已随师部进驻银川，原驻地仅有小部分人留守。拂晓时分，我们团领导决定部队突围到185团团部，刚走不到两公里，就被堵住了，农民们睡在公路上，还挖了坑。至中午，勉强前进到185团团部驻地，农民又围了上来，干部战士情绪很大。而保守派甚至扬言如果部队再往前开，就要炸掉大坝。为防不测，我率团基本指挥所在大坝上警卫，团长则留守在大坝下的团部。”

青铜峡是黄河上游峡谷地段的最后一个峡谷。以灌溉和发电为主、兼备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功能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开工建设，其发电部分为河床闸墩式低水头电站，时虽尚未投运发电，惟长160米、高43米的拦河大坝早已于1960年建成截流。这么一座大型国家重点工程，真的要“炸掉”，绝非易事，“大联筹”当时想必也是头脑发热，口头上说说而已，真的要做起来，恐怕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能量。但即便是在1967年这样混乱的年代，放出这样的狂言以为要挟，也实属全国之未见，宁夏“大联筹”开这么一个先例，也确实太狂妄了点！

许昌其说：“8月28日傍晚，徐洪学来电话，要求作好反击准备，中央有电报，马上会转到。晚上九时至十时左右，62师转军委电报，要求要出击，坚决打下去。我命令枪朝天打，但部分干部战士有情绪，混乱中向群众开了枪，造成在大坝上的部分群众死伤，死了四十多人。”

“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

四、谁应为开枪负责？

“青铜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文革中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普遍都是造反派，而“青铜峡事件”中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的，却是保守派。

冼恒汉回忆道：“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5〕冼未指明的是，所谓“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大联筹”。

冼又说：“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6〕而当时现场指挥的许昌其在对笔者的叙述中，并没有指“大联筹”有“准备炸坝”的实际行动（只有“扬言”），也没有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这样的严重情节。那末，到底是谁——186团？或62师？或兰州军区？——向上一级夸大了事态？

至于北京中央方面的态度，冼恒汉在回忆中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

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7)。

冼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8)。

正如许昌其所说:“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1967年12月9日,宁夏四派在京共同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中发[67]407号中共中央文件),决定建立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翌年4月,宁夏革委会成立,宁夏全区局势基本稳定,而青铜峡部队开枪一事,在文革中从未再被提起。

“青铜峡事件”再次成为一个“事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3月。当月,宁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发〔67〕407号文件的批复和关于为“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昭雪的批复,宣布了兰州军区党委对宁夏军区《关于为原宁夏军区党委和朱声达、江波、何其仁等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邵井蛙在平反大会上称:“所谓‘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完全是康生伙同×××等一手制造的一大冤案。……直接责任应由康生等负责。”(9)

笔者比较相信冼恒汉《风雨八十载》中的说法。冼实际上是澄清了:康生只不过是受周恩来的委托,传达中央的决定。兰州军区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是中央政治局包括毛泽东本人同意的,将责任推到康生一个人身上,并不公道。而按许昌其的回忆,对青铜峡事态的处理,应该还有军委的命令,这更不是康生所能够负责的。

文革结束后,除冼恒汉外,“青铜峡事件”其他当事人的仕途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徐洪学1978年2月由陆军第21军副军长调任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仍为副军级);许昌其文革中于1969年已升任62师政治部主任,1976年8月升任62师政委,1978年8月调任61师政委,1981年3月升任21军政治部主任,1983年5月后任军顾问,1988年8月离休。

陆军第62师于1985年1月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师,脱离21军建制,隶属宁夏军区领导。186团同时改为守备第2团。1992年9月,兰州军区守备师撤销建制。(2008年4月)

注释:

(1) 周恩来1967年5月11日在《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讨论稿上的批示。见中发〔67〕230号中共中央文件。张指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

(2) 本节内容,参阅《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及刘秉荣:《朱声达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3) 本节内容,主要参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守备师(原六十二师)师史》(兰州军区守备师师史编写组,1992)。

(4) 访问许昌其谈话记录,2002年9月12日,西安。

(5)(6)(7)(8) 冼恒汉:《风雨八十载》(冼玲的博客, <http://9link.116.com.cn/node/29951>)

〔9〕刘秉荣：《朱声达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页492。×××，指洗恒汉。

~~~~~

## 【深度思考】

### “9 1 3 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

• 袁策祥 •

“9 1 3 事件”中一个最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是，以中共精锐强悍的“8 3 4 1”警卫部队竟然未能阻止林彪一家的外逃出走，而作为林彪贴身保镖的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不仅没有善尽职守，反而临阵逃脱。这里蕴藏着一个未被人们深入揭示的巨大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以前曾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但是本人一直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试图根据已披露的有关资料，对这一事件，特别是李文普的角色作一深入的分析。

#### 一、李文普回忆中的疑点

李文普在9 1 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如果不是林彪的死党，他却一手促成了林彪的逃跑；如果是林彪的死党，他却半途跳车，还被林彪儿子林立果“击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不是他当机立断、果断跳车，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纵观其在9 1 3中的行为表现，可谓深沉诡秘、高深莫测。

作为警卫处长，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9 1 3事件发生之前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已经预感山雨欲来，对李文普千叮咛万嘱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李文普在林家工作了近二十年，林立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李的立场和能力。最后林彪的逃跑行动以机毁人亡而告终、以叛国投敌为定论。对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以及其家人亲友对李文普的言行颇不谅解。李文普针对张宁女士《尘劫》一书的描述，事后也写了一些回忆自辩：《林彪事件与我》，这应该是他自己亲笔所作。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其中有不少言不由衷、语焉不详和故意编造的情节，文章不足采信，无法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关于林彪的座车从北戴河9 6楼出发后有没有受到阻拦，双方各执一词。现在已经弄清楚的事实是，林彪的座车不仅受到了阻拦，而且还被8 3 4 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打了两枪。这个细节有当时在场的吕学文提供证明。吕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著有回忆文章《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据吕学文回忆，轿车受到阻拦，先减速后加速，冲过了第一道人墙，在通过第二道人墙被肖队长打了两枪。李文普却说：“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9 6楼下来，经过5 6楼、5 7楼到5 8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完全否认了林彪座车冲击人墙和被枪击两项事实。汽车夜间行驶是要开车灯的。不管天怎么黑，李文普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汽车大灯光柱强烈地照射下，前方几十个人排成的人墙是绝不可能看错的。而且林彪等人遗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红旗轿车上的有明显弹痕，表明肖奇明射出的子弹都打到了汽车后挡风玻璃上。轿车是防弹的，车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但子弹打在玻璃上的巨大的声音他们不可能听不见。李文普描绘出一幅汽车在宁静祥和的夜色中快速行驶的景象，对这两项事实全部否认，分明是撒谎。

这个谎言拙劣无比，因为现场有几十号人，未来得及统一口径，事实早就扩散到不可控的

地步了。但此事李文普非撒谎不可，因为他如果承认林彪座车被阻拦、被枪击的事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职。作为负责林彪安全的警卫处长，李文普应在出发前做好一切协调和工作，确保安全后才能行动。实际上此程序按部就班，各单位已经是滚瓜烂熟，只要一声号令就会自行行动起来。据林立衡9 1 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当时8 3 4 1部队二大队副队长姜作寿已经坐在先行车上，只等一声命令就可以出发。结果命令没来，林彪的车先上来了，他们只好把路让开让红旗车通过。问题很清楚，并不是8 3 4 1部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服从指挥护卫林彪出行，而是负责指挥的张宏、李文普违反条例，未采取必要的行动，从而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李文普为何放弃职守、一反常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而且一直竭力回避的问题。如果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无法履行职责，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拒绝发车；如果拒绝发车做不到，他至少可以做到自己不要主动上车。实际情况表明，李文普当晚的行动完全是积极的、主动的。林彪座车发生被阻拦、被枪击这种意外，完全是李文普的责任。如果林彪当晚不出意外，李文普至少是擅离职守，乃渎职是也。问题是发车之前，按李文普的说法，他并不知道林彪这一走一定会发生意外，那么谁借给他这么大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李文普何时得知林彪一家逃亡的消息的？

## 二、李文普何时知悉林家逃亡之计划？

李文普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于9月12日下午才得知这一情况的：“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行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在9 1 3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林立衡说的时间是9月7日，比李文普的说法提前了5天。到底谁在撒谎，必须调查清楚。因为这个时间实际是破解9 1 3之谜的关键。9 1 3事件到底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早就在有关部门的控制和掌握中，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判定依据。

林立衡材料中提到的刘吉纯是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事后出版过回忆文章，证明林立衡的说法是正确的。刘吉纯在《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里回忆说：“晚上（9月7日，笔者著），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张：张清霖，林立衡的未婚夫；杨：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除了刘吉纯的回忆，林办秘书宋德金在《“九一三”事件亲历记》中也提到了此事：“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可见，林立衡的说法有多个证人支持，撒谎的还是李文普。

李文普知道林立果外逃阴谋的时间应该是9月7日。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这套制度可以防止警卫部队蜕变成私人武装，防止军队首长拥兵自固，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军阀。此制度是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李文普是党的干部，受党的派遣为林彪服务，不是林彪的家臣。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李文普不会为首长保守什么秘密，即使他想保，别人也会报告，上面迟早会知道。所以晚报不如早报、别人报不如自己报。从林立衡的材料中透露的情况看，刘吉纯从林立衡那儿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向上汇

报了。林立衡12日晚去找张宏的时候，跟张宏说：“我是提著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张宏对林立衡汇报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刘科长”早就跟他说过了。李文普不是傻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办的保卫干部不止他一个，知道消息的也不止他一个，不管他个人意愿如何，要说他守口如瓶、没有向上报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所以，中央接获林彪一家意图外逃的时间不可能晚于9月7日。包括李文普在内的不同来源、不同渠道的情报都证实了同一件事情，此事不可能不引起最高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在南方的行止由此变得更加诡秘。从此以后，林办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变化，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面孔，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悄悄地控制了局面，必要的时候会让一些人做出身不由己的举动，也令不明真相的人们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也难怪，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己隐藏得非常完美，只在不经意间露出一蛛丝马迹。张宏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是当时8341部队在北戴河地区的最高领导。9月12晚，林立衡多次央求李文普未果，不得已去找她并不认识的张宏，希望张采取措施保障林彪安全。张宏先是满口答应，林立衡才放心地离开。在叶群通知林立衡拿行李准备马上出发飞广州时，林立衡赶紧跑到大队部找张宏。张宏此时态度大变，对林立衡的央求置若罔闻，反倒叫林立衡“中央指示你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没有料到林立衡会直接到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所以有点应对失措，张宏前后判若两人。其态度的明显变化和那句“中央让你也上飞机”的命令，几乎是913事件中唯一的破绽。唯在此处，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闪即逝、羞涩地现出一点点行迹。

所以，“有关部门”绝不是9月12日才恍然大悟“林彪要跑”，放弃对林彪的保卫也不是李文普一时心血来潮。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因为它总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李文普为了掩饰自己的双重身份、否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不得已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捏造的痕迹是如此之明显，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

### 三、李文普为何中途跳车？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跳车？按照李文普的说法，他听见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后，“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保卫干部最基本的信念是以国家利益、首长安全为重，自己的生命尚在其次，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李文普在林办当了近二十年警卫处长，恐怕没少背诵这个教条教育别人；可到了关键时刻，别的没想起来、先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个情节编造得实在是滑稽可笑。何况当时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止林彪叛逃。李文普跳车时，林彪的座车还没出大门，后面就是荷枪实弹的8341部队官兵，李文普只要使个眼色叫司机大杨一同跳车，林、叶等人来不及应变，唯有束手就擒，叛逃计划立刻成为泡影，叛徒一说从何谈起？

就算李文普一时糊涂，关键时刻只想起了老婆孩子，跳车以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林彪一伙准备逃往广州、香港。林彪突然泄露逃亡的目的地为伊尔库茨克，这是敌情的重大变化，有关部门还无从知晓。如果不及时报告中央，采取有效措施，林彪一伙可能侥幸逃脱，党和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保卫干部，李文普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报的重要性和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时的李文普已经完全脱离了林彪的控制，安全保障没有问题，可以从从容容向北京最高当局报告。可是李文普自己的回忆却说：“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报告了没有？没有，连报告的念头都没有！岂不是怪哉？李文普难道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提前知道毛泽东准备放林彪一马，所以把这个重要情报烂在肚子里？



李文普跳车后，左臂受伤。医生问他受伤的原因，他当时说是“枪走火”。大约半年以后，在审查中他改变说法，称是被林立果从车里开枪击中的；当时林立果已变成温都尔汗的一撮黄土，无法提供证明。自伤、他伤都是李文普自己说了算。但他伤之说，推敲之下实在是漏洞百出。首先，李文普出尔反尔，可信度就是个问号。其次，依常理推测，李文普并没有参与林、叶等人的逃亡计划。作为中央派到林彪身边的保卫干部，李文普不仅随身配备枪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调动部队。他恰恰是林彪、叶群一伙叛逃路上最大的障碍、最直接的威胁。林、叶等人如果事先有预谋地叛逃苏联，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甚至除掉李文普。现在李文普一声“停车”，自己跳了出去，林立果、叶群等人松了一口气，拍巴掌还来不及，怎么会打他一枪？

李文普描述当时的细节：“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李文普描述的场景声情并茂、十分生动。但有一个问题，这个“车门的响声”是开门还是关门？如果是关门，说明门原来是开着的。林立果先关门后开枪岂不要打在门上？如果是开门，说明原来门是关着的，那李文普和叶群的对话是如何进行的？

其实，这段场景当时在场的吕学文也有一段描述，显得更为可信：“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连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吕学文是现场目击者，跟谁都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撒谎的动机。所以他的描述比较客观。从他的叙述看，李文普跳下车后，并没有跟车里面对话的动作。李朝车后跑了几步，朝后面喊话。此时他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后车门，甚至超过了车尾，林立果位于他后方，开枪只能击中他的后背，绝无可能“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

综上所述，李文普这一枪不可能是林立果打的。李文普后来改口只能是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乃应景之作。李文普最初的说法基本是事实，但不是李的枪支走火，而是李文普自伤。

#### 四、李文普为何自伤？

李文普自伤一说由来已久，但对李文普的动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解释。一般认为，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为了嫁祸于林立果，与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立场。可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非常谨慎，医生问他怎么受的伤，他只说是自己“枪走火”，并没有嫁祸于人的意思。而且，李文普跳车已经表明了立场，这一枪并非完全必要。如果想表现更坚定的立场，这一枪打在林立果身上效果比较好，若打在他自己身上，似乎没有特别强的说服力。这一枪代价十分巨大，左臂粉碎性骨折，一条胳膊终身残废，不是万不得已，李文普绝不会出此下策。

什么万不得已的情况令李文普不得不自伤？要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引入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这只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张宏、李文普等系统内的人士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张宏前后态度迥异，显然是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的结果。他传达给林立衡的指令是“中央让你也上飞机”，可以看出中央的策略是“欲擒故纵”。9月12日晚，林立果、叶群蠢蠢欲动，林立衡心急如焚，李文普其实也是紧张万分。要说李文普不想保护林彪，那不是事实。他服侍林彪二十年，毕竟有一份感情；何况林彪有个三长两短，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但他若真想保护林彪，也不是没有办法；当时就连警卫科长刘吉纯也感觉出气氛紧张，建议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我和李文普一同看过林立果的房间之后，回到96楼院子里。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他没表态。”林立衡在9月12日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都被李文普拒绝。可见，当晚林彪的座车失去保护，未出大门便受到阻拦和枪击，绝对不是李文普的一时疏忽。以李文普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他也不敢胆大妄为到把林彪的安全当儿戏。这一切，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控的结果。从9月7日有关部门接到线报后，林办的一举一动都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安全。李文普一个小小的警卫处长，哪有权力决定如此重要的事情？

看起来，林彪家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都在有关部门的掌控中，最终的结局也在其预料之内。整个行动几乎完美无缺，唯有两个微不足道的瑕疵：有关部门高估了林立衡的忠诚，低估了李文普的智力，致使这两个应该上飞机的人都没有上飞机，留下了两个可能泄露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缺口，只好事后再做弥补了。

林立衡的所有要求都被李文普拒绝，只好孤注一掷，直接到58号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揭发其弟其母。李文普对此举相当鼓励，派刘吉纯陪同林立衡前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文普的矛盾处境，并不是他不愿意保护林彪，而是没有上面的命令，他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林立衡的告密起了作用，上面发下话来，他一定会积极执行，不会有半点犹豫。根据林立衡的描述，叶群派人四处寻找林立衡准备马上出发时，林立衡正与李文普在一起。“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著头，当著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可见李文普也紧张到了极点，在最后一刻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期盼张宏能带来新的指令。

林立衡在大队部亲眼看见张宏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消息直接传达到了顶层，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作借口，反馈回来的指令都具有最高效力，这是林立衡、李文普的最后一线希望。当时大队部的情景十分尴尬，张宏都不好意思，躲出去了，杨森找了好一阵才把他找回来。如果周恩来在旁边，一定会重复当初对罗瑞卿说过的话：“你们太天真了，太天真了！”张宏支支吾吾、百般拖延，就是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令林立衡极度失望和愤怒，乃至对“中央”的忠诚暂时打了一个折扣，对“跟著上飞机”的无理要求也就置之不理了。张宏在一旁催促和威胁也无济于事。林立衡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说：“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李文普的失望和焦虑应该不在林立衡之下。但多年的职业生涯带给他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冲动。林立果自以为计划周密、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握中。以李文普的身份，他对这个局面十分清楚。林立果的一些小动作，在干了一辈子革命、从惊涛骇浪里滚出来的老家伙眼里犹如儿戏一般，他的逃跑计划绝不可能成功。为了防患于未然，防止局面不可收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林立果抓起来。当时并不是没有动手的理由，林立衡绝对愿意大义灭亲、提供证据。林立果在北戴河也没什么力量，李文普带几个人就可以把他摆平。可是中央就是按兵不动，连一点声色都不许露。看样子林立果并不是最终目标，中央的胃口是林立果背后更大的鱼。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莫非……李文普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局面。9月12日，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疑问不幸得到了证实。李文普得到了明确的指令：不得对林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看样子林家是要被一勺烩了。

有关部门给李文普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大发慈悲，主动替李文普安排出路；相反，李文普知道太多内情，永远闭上嘴巴是最理想的结果。“中央指示你跟著上飞机，跟著走”也许同样是给李文普的命令。这条命令林立衡可以不执行，但李文普不可以。林立衡表示拒绝上飞机时，张宏威逼道：“这是中央指示。”可是中央

指示对林立衡并没有什么效力，是否遵从完全凭林立衡的意愿，违抗了也无法追究其责任。但李文普是系统内的干部，对于正式下达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是抗命，没有充足的理由交代不过去。9月12日，李文普已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跟着走肯定是死路一条。思来想去，为了保命只好耍无赖、装死狗了。

当晚，李文普遣散警卫，安排林彪、叶群等上红旗轿车，约11：55分从96楼驶出，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主要任务，开始寻找自己脱身的机会。车到56楼，肖奇明打响了913事件的第一枪，这一枪并没有对红旗防弹轿车造成任何损害，却给李文普送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李文普对大杨说：“停车，我去问问怎么回事！”下了车，李文普朝后跑了二步，喊道“不要开枪，首长在上！”一边就地卧倒，掏出手枪，“砰”……李文普悬崖勒马、果断跳车，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但他违背了保卫干部的信条、放弃了保卫首长的责任，因此担上了一世的恶名，这是他必须承担的后果。不过，相比惨死在温都尔汗的256机组和司机杨振刚等人，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结局了。

## 五、跳车之后

913事件后，林立衡的生存比李文普容易得多。首先她并没有掌握什么核心机密，其次她的身份使她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当局不得不考虑一点公众影响。更重要的是林立衡在8341部队众多官兵面前大义灭亲，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忠诚，当局不好硬来。李文普可不一样。正反两方群众都是群情激愤、对他没有一丝怜悯。拿他祭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职守、放跑林彪；对此林立衡一定会拍手称快。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没有坚强的意志、超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文普和潘景寅是913行动的具体执行人，了解核心秘密，也是首当其冲被考虑灭口的对象。根据计划，林彪一家包括林立衡和李文普都应该悄悄地上飞机、共赴瑶池仙会。如果计划成功，就没有任何知情人留下，更不会有鸣冤叫屈的情况发生。张宏和8341部队本来不应被牵涉进来。可实际执行的时候，林立衡在李文普的怂恿下不顾一切的大闹，使整个计划出现了一点偏差，让913事件多出无数个活的见证。张宏、杨森、姜作寿、肖奇明以及众多8341部队的官兵不同程度地被牵涉进来，对事后林、张二人的生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李文普的过人之处。比如在出逃前最紧张的几个小时里，李文普一方面鼓励林立衡直接向8341部队报告，以最大的努力改变中央的决定；同时他总是当着林立衡、杨森等人的面，叫刘吉纯传口信：“你叫张宏给我联系”，其实他直接给张宏打电话也是可以的，他却故意叫人传口信，原因就是为自己多拉几个证人，日后好说话。同时，多几个证人也可以分散当局的目标，准备杀人灭口时多一点顾忌。

李文普自伤一枪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他营造一个避免开口说话的环境。李文普深知他掌握的秘密足以使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想生存唯有证明留他比杀他更有价值；首先他必须让人相信他会守口如瓶。中枪后往医院一躺，尽可能地不说话、不与人接触，就很好地表明了态度，保护了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军医要把李文普送到空军疗养院，李文普坚决不去，理由是“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这个理由一看就很牵强。一般受伤、生病的人都希望有亲人在身边，一方面让亲人安心，另一方面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李文普选择回避，有点不合常理，真正的原因是怕祸从口出。到底说没说别人是不知道的，可一旦有人怀疑，他女儿便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李文普机警之至，断然拒绝，可见其心思缜密，是合格的保卫干部！

李文普在 9 1 3 中的角色属于绝密，本来连张宏、刘吉纯、姜作寿等人都不应该知道。林立衡突然跳出来搅局的结果，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牵涉进来。这使策划者十分被动，一旦张宏领导的 8 3 4 1 部队二大队出现自发行动，整个计划就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使计划继续进行，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得不出面协调张宏与李文普的行动。李文普正是利用了这点，不管“上面”是否愿意、张宏是否愿意，就叫刘吉纯找张宏“让张宏与我联系”，这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刘吉纯和张宏等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命令。这就是李文普的生存策略。张宏等人很快了解李文普的真实处境，知道李文普原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是李文普事后能够侥幸生存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自伤逃生的李文普处置太过严厉，未免会使已经了解内情的张宏、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兔死狐悲，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最高领袖的安全毕竟还得依靠这些人来保护，李文普只要不自己惹是生非，各方面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了。李文普事后确实表现得得体，不仅没有泄露半点机密，而且为专案组提供了林彪叛逃的重要证据，挖掘出了丰富的剩余价值。根据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系统内的领导竞相为李文普开脱，并不是这些人良心发现，也不是李文普烧香拜佛的结果；而是李文普的身份已经穿帮，若不保护，难以维持秘密战线上无数个张文普、马文普继续卖命的积极性。

## 六、解读李文普

李文普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9 月 1 2 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他紧张什么？林彪的安全面临威胁，这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李文普的职业生涯中可能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可能被迫采取行动，导致某种无法预知的后果。面对这种局面，任何人都会紧张。所以，前半句话“我一生中最紧张”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后半句“思想斗争最激烈”。关于自己思想斗争，李文普在文章里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为什么会有思想斗争，是什么思想跟什么思想斗争，他没设；不过这不经意的半句大实话背后却是大有文章。

按理说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在这个前提下，他应尽其所能，增派人手、加强警戒，二十四小时不离林彪左右；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林彪的安全，这对李文普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战士在临上战场之前，应该只有抛却生死、壮怀激烈的豪情，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何说起呢？显然另有一股力量掣肘他的行动，阻止他履行固有的使命，令他左右为难、难以抉择。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对家人的牵挂？不像！是对林立果、叶群的投鼠忌器？也不是，如果按照刘吉纯的建议，拉上七、八个带大家伙的小战士不离林彪左右，林立果、叶群就不敢轻举妄动，李文普也用不着担心与他们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了。

只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林彪有想法。如果林彪自己想跑，确实会令李文普左右为难，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拦还是不拦？李文普后来的实际行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李文普后来没有拦，放了。如果这是他的本意，林立衡晚上准备向中央报告时，他就会全力阻止；因为一旦林立衡报告上去，到时候自己不想拦也得拦，还添了个隐瞒不报的罪名，对他自己岂不是大为不利？根据林立衡所述，李文普对林立衡的告密行为相当鼓励。显然，这种解释会导致自相矛盾：李文普不想放，可最后他放了；他想放，却让豆豆去报告，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双重身份。这两个身份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一个是直接首长林彪，另外一个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这两个对象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也是完全重合的。直到 1 9 7 0 年 8 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中央文

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两位服务对象产生的矛盾使双重身份发生了分裂，令李文普极为痛苦，因为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背叛。

思想斗争固然令人痛苦万分，该何去何从却很容易选择。9月12日下午，李文普傍晚时分从林办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是去空军疗养院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切部署，率领一行人回到了中南海。有人给李文普传了个口信，让他与刚刚归来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张耀祠单独联系了一下，汇报了一下近期的工作。电话里，张耀祠对李文普近期的表现很不满意，声色俱厉地训斥：“你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自己的了！”本着我党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张耀祠代表党中央、中央警卫团给了李文普一个机会，只要他勇于表现、戴罪立功，依然是党的好同志。

李文普瘟头瘟脑回到林办，和刘吉纯一起给林立果准备房间。刘吉纯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惜不符合中央精神。李文普当时心情很不好，又出于保密，什么话也没说，也说不出什么话。对于中央的决定，李文普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以他的身份，即没有申辩的机会，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林立衡准备向中央报告的时候，李文普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希望中央不同的领导听到报告，也许会对“上面”施加一点影响、改变一点策略。所以李文普对林立衡的举动非常赞同，并吩咐刘吉纯陪同前往：“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可惜他得到的是再一次的严厉督促。最后，叶群吩咐备车，马上要走了，李文普还不死心，幻想张宏会在最后一刻传达中央的命令，改变原先的决定，急切地叫刘吉纯通知张宏与他联系。可惜，矛盾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必杀之利器一旦启动也不会无功而返。一切，无可更改。

李文普那一枪，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抗议，但无论如何不是林立果打的。按照李文普的说法，那一枪距离他只有1米，几乎是顶在身上打的。这么近的距离，没有打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却打到了胳膊上，若非电影《虎口脱险》里斜眼下士那种天生异人，一般人难以做到。

一夜之间，林办秘书们和林彪的家人亲友跌下神坛，饱尝世态炎凉。这些人对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有任何好感；然而，凭心而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李文普头上也是不公道的。林彪倒台对李文普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根本没有加害林彪的动机，相反，他在暗地里肯定也试图做了一些挽救的工作，只是不为外人所知。林立衡、张宁等人有一件不依不饶的事，就是李文普交代的一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根据张宁等人的说法，李文普以此换取了三项条件：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这句话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性铁证，李文普也成了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是由《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确定的。此文件首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开会传达，然后逐级传达到全国各级干部群众。57号文件发出时间是1971年9月18日，是孙一先等人勘察完现场，从乌兰巴托向国内发回电报，确认林彪死亡的第二天；也就是913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文普交代那句话是什么时候？根据林立衡、张宁等人的说法，是在事发半年之后。可见，中央定性在先，李文普交代在后，时隔半年之久。李文普的交代只是给林彪案件的定性加了一个注脚，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李文普如果不跳车，温都尔汗徒添一具死尸，中国徒添一对孤儿寡母，913事件从此被掩盖得天衣无缝，内幕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李文普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生存，成为913事件唯一了解核心机密的知情人士、活的见证，实在大智大勇，超出常人。若有一天他能畅所欲言，彻底解开913之谜，那将是普天之下所有关心此事的热心人士的造化。

## 七、几句题外话：坠机现场的再辨析

几十年来，9 1 3 事件的真相一直众说纷纭。2 5 6 号坠毁后，当时中国驻蒙古使馆的许文益大使、孙一先秘书等四人曾奉命到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的现场勘察。近年，孙一先出版了《在大漠那边》一书，披露了一些当年现场勘察的情况，为我们了解2 5 6 号的坠机现场提供了宝贵资料。

根据孙先生的描述，现场有一个情况令他极感意外，就是虽然飞机严重解体，但机上九位乘员的遗体完整、分布有规律。2 5 6 号最后像香蕉皮一样被撕成了上、下二瓣，机头部分连在一起。9 具遗体的位置差不多都在下半片机身与舱内物品残骸的分界线上，大概就是客舱地板附近。根据现场痕迹判断，2 5 6 号落地后没有发生翻滚，机腹滑行比较平稳，飞机运动轨迹比较规则，所以飞机在迫降过程中机上乘员的位置应该没有很大改变。9 具遗体的位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生前在飞机上的位置：潘景寅和叶群在驾驶舱内，三位机械师郇起良、张延奎、李平和林彪在离驾驶舱不远的位置，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三人在一起，大约在机身中段。

这个位置分布极其怪异。不合理之处在于，为什么没有其他机组乘员在驾驶舱内帮助潘景寅实施迫降？

正常情况下，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必须由正、副驾驶共同驾驶，因为操作繁多而且不能有半点差错。当时2 5 6 号的机组没有到齐，副驾驶不在飞机上，但有机械师可临时替补。2 5 6 号之所以能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就是机组进行了重新分工的结果。康庭梓分析：“李平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完成他分工做的起飞动作。张延奎可能是坐在副驾驶座位后边空勤机械师的座位上，郇起良则可能站在中央操纵台的后面，这样从舱顶到操纵台的任何位置的开关，他都可以够到；凭他对各种特种设备熟悉的程度，会准确无误地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工作”。2 5 6 号当时进行野外迫降，比正常降落更是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潘景寅至少可以采用起飞时的组合，充分发挥每一位机组人员的作用，避免任何遗漏或错误，增加自己和所有乘员的生存机会。可实际情况居然是没有任何一位机械师帮助潘景寅，反倒是对飞行一窍不通的叶群呆在驾驶舱内，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

从遗体的分布来看，飞机被林立果劫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三位机械师离驾驶舱更近，林立果等三人反而比较远。而且孙一先根据现场情况认定：“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不仅没有任何对抗，反而有三位机械师齐心协力保护林彪的痕迹：“令人诧异的是，四、六、七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其中的6号是张延奎，其遗体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作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这个明显的特征说明张延奎生前紧紧抱着什么东西，而且正因为这个东西的保护，使得他的下腹部的烧灼较轻，器官保存比较完好。四个人中只有郇起良是趴着的：“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非常像是背着什么东西的姿势。7号是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是保护什么东西的架势。不难猜测，三个机械师围成半圈，一个背、一个抱、一个护着的正是位于三人中间的林彪。三个机械师在最后关头，完全不顾自己的危险，用肉体当盾牌严密地保护林彪，令人感慨。特别是郇起良背负林彪，必须用自己身体的正面抗击烈焰、碎片和与冲撞等致命打击，受伤最重。“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郇起良的面部应该不是在软地上摔烂的。因为摔得这么重，脸的一半应该都陷到地里面去了。更大的可能，是在飞机的不规则运动中与舱壁等硬物冲撞造成的。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致命的伤害，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无论在什么价值体系下，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英雄。

四个人中林彪和郇起良有非常明显的外伤，林彪左腿折断、郇起良“面部全被摔烂”。我们有理由相信，飞机迫降前，这四个人不在座位上，也没有系安全带。不仅如此，后面的三个人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在飞机迫降前也不在座位上，而是挤在一起躲在机身中段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这三个人与前面四个人的情况相似，刘沛丰和杨振刚都有严重的外伤，只有林立果稍好一点。在这两堆人中，林彪和林立果被夹在中间，显出极其明显的被保护特征。这些人在飞机迫降前，不在座位上坐好、系紧安全带，反而离开座位，这也是极为反常的现象。

乘坐汽车、飞机等高速运动的交通工具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据统计，汽车事故中，系不系安全带事故死亡率相差4倍。因为不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乘客很容易被甩出座位，即使没有当场撞死，也会因为昏迷、骨折或内脏受伤，导致失去自救能力，一旦现场着火就会因无法快速脱离而失去生存的机会。飞机速度比汽车更快，即使是正常降落乘客也有强烈的冲击感。如果不系安全带就有可能被撞伤。所以在飞机的起、降阶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没有人会不系安全带。

特别是飞机遇险迫降，第一道保护措施就是系好安全带；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它的措施恐怕都没机会用上了。因为迫降的飞机往往会引起火灾甚至爆炸，所以飞机落地后所有乘客必须尽快脱离现场。无论你坐过多少次飞机，空姐在起飞前都会强调系好安全带，并示范一种双手抱头、蜷缩身体的姿势。这道必不可少的手续，就是为了教会乘客保护自己，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保留一定的行动能力，增加生存的机会。

林彪等人在飞机迫降前违反常规、离开座位，如果不是生命已经受到更直接的威胁，绝不会如此。很多现场证据以及不止一个目击者的证词都表明，256号在空中已经起火。飞机上的乘客为了躲避机舱内燃起的大火和浓烟，不得已离开座位躲到二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林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没有行动能力，三位机械师背负肩扛，把他转移到了某个火势稍缓之处。因为飞机着火，发动机或其它机件失灵，飞机已经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操纵。256号在茫茫黑夜中如飘零的落叶，危在旦夕。潘景寅只能凭本能与死神进行无望的较量，机械师在驾驶舱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进入客舱帮助已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中的林彪等人。这是唯一能对现场的遗体分布作出合理解释的推论。

笔者根据256号舱内布置图判断，这二伙人分别躲在前、后登机门处。因为这二个地方比较空旷，没有可燃物，火势稍缓。舱门上还有一扇小舷窗可以打开，有新鲜空气吹进来可以冲淡浓烟和毒气，暂供呼吸。而且一旦飞机成功迫降，他们能够迅速打开舱门、脱离现场，尽力逃生。可惜元帅之命早已天定，温都尔汗注定是他的长眠之地。血肉之躯毕竟难当毒烟的熏灌和烈焰的燎烤，在迫降过程强烈的冲击和颠簸中，机舱内的人全部昏迷，并在减速过程末期从支离破碎的机体中滚落到地面，彼此分开了几米的距离，然后在大火引起的高度缺氧中就直接窒息身亡了。

从9位成员的遗体分布看，机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对立或冲突；相反，机组和其他成员对林彪、林立果二人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所以劫机与反劫机斗争一说是站不住脚的。可能的情况是，当时飞机上只有潘景寅1人知道当时他们的真实位置，其他人毫不知情，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没有死绝，沉冤必会得雪，真相终将大白。盼此日早点来临，以告慰林彪元帅和“913事件”中的枉死之人。

参考书目：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张宁《尘劫》明报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林立衡《913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 [www.linbiao.org](http://www.linbiao.org)

李文普《林彪事件与我》原载《信使文摘》2000年10月19日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见《文史精华》2005年4期

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德金《“九一三”事件亲历记》见《百年潮》

□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

【回首文革】

席卷画坛的“文革”风暴

• 吴继金 •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阴霾笼罩。这场可怕的风暴同样毫不留情地席卷了当时的整个画坛。有很多优秀的绘画作品被荒谬地阐述和剖析了“政治寓意”而被批判，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一时间，新中国的画坛承受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洗礼。

◇ 美术界受到批判第一人：华君武

“文革”一开始，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杜甫检讨》和《科学分工？》两幅漫画就遭到了批判。“造反派”在揭露华君武的《杜甫检讨》漫画时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可是，周扬却唱反调说：‘我们的反修斗争扩大化了。’于是，华君武就马上画了《杜甫检讨》这张黑画，恶毒诽谤伟大的反帝、反修斗争。这幅黑画捏造了杜甫的‘检讨’，用‘兵车行乃和平思想’这句恶毒的噱头，嘲讽伟大的反修斗争，用意十分歹毒：一方面诬蔑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进行的斗争；另一方面攻击我党‘杞人忧天’，国内本没有修正主义，却硬要‘到处找修正主义批斗批判’，连杜甫也只好‘检讨’了。”他们还诬蔑华君武的另一幅作品《科学分工？》是“影射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是定调的‘暴君’，辱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唯命是从的奴仆。画中用一个人吹笛，另一个人捂眼的形象，咒骂对文艺的领导是‘粗暴干涉’，是‘占据一切’，‘代替一切’。”

于是，作为全国美协秘书长的华君武被红卫兵指责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实干家”，主要罪状有：是三十年代上海资产阶级右翼漫画家，反党漫画老手，反对歌颂毛泽东的美术创作，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四人帮”垮台后，华君武曾经很有感慨地谈起当时所受的折磨：“‘文革’开始，我就成为美术界第一个作品受到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东风》刊登的许多我的漫画成了‘大毒草’。至今不忘的某次批判会，把我的漫画和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结成一对一，当时我做着‘喷气式’，侧眼想看也不允许，但批判时说：邓拓怎么说华君武就怎么画，生扯硬拽就拉在一起了。”

◇ “未表现领袖的正面形象”而遭批判的钟涵

钟涵1963年创作的油画《延河边上》，有别于其它表现领袖题材的作品：它的画面上灿烂的夕阳辉映着大地，远景落日使延安的宝塔山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暖色调中，没有用通常表现

伟人正面、突出、高大手法，而是用领袖和农民谈着家常徐徐漫步在延河岸边的背影；画面中的毛泽东和当地的一位农民背对观众，他们出现在傍晚时分的延河边和宝塔山前，是那么宁静而亲切，又是那么自然而传神。作者将这一崇高的英雄主题寓入平实的写实角度，将寻常的生活情节发展为浪漫象征的艺术匠心，要表达的正是毛主席“作为群众的领袖那种诚挚、朴素、平易近人、对人民怀有深情”的“延安作风”。

可是，恰恰是这种独具匠心，突破陈规的创作手法，“文革”时期却给钟涵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延河边上》由于没有“正面表现”领袖的正面形象，竟被江青扣上了一项“歪曲毛主席形象”的大帽子。画作被打成“黑画”，作者钟涵被打成“六十年代黑线人物”，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不仅如此，与这幅画有关系的人也被牵连进去。曾辅导过钟涵创作的著名画家罗工柳先生因此获罪，画家艾中信因为曾经写过评论这张画的文章而被扣上了一项“对抗江青”的帽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 “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万岁》的哈琼文

哈琼文于1959年创作了一幅名为《万岁》的宣传画，这是一幅具有广泛影响的美术作品：先后重版20多次，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曾被配以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被带到美国、前苏联、南斯拉夫、英国、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摩洛哥及冰岛等国。

这幅受到广泛好评的宣传画，在“文革”中却被指责为：“完全堕落成为麻痹革命人民斗志，扼杀革命人民斗争，配合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推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

当时，所谓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总革命委员会宣传部”、“上海美术界革命造反派批黑线联络站”在其编辑的《彻底砸烂美术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一文集中对《万岁》宣传画展开了大肆的批判。在《把美术界“全民文艺”的黑样板揪出来示众——揭穿宣传画〈万岁〉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注脚：“《万岁》此画原名《毛主席万岁》。这幅画以‘毛主席万岁’这一庄严口号为幌子贩卖资产阶级黑货，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莫大侮辱，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避免在批判中引起误会和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的不尊重，以后提及此画，均称为《万岁》。”该文批判的焦点是画面那个“身穿黑丝绒旗袍，领前缀以鸭蛋形翡翠别针，戴着一副珍珠耳环，十足资产阶级少奶奶的形象。”文章批判：作者在构思初期，画了好几张草图，在这些草图中，有的出现了毛主席，有的以毛主席为主、衬以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场面。所有这些都不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满意。作者为了迎合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需要，最后以这个舞女为对象画了一个娇艳十足的资产阶级少奶奶。作者原先创作的草图中，为了说明节日游行，在作品的左上角远处有一张小型的毛主席画像。可是就连这一点也不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接受，他们狂妄地以“作品中两个形象互相削弱”“要含蓄”“要使人联想”为借口，责令作者将毛主席画像砍掉，这样《万岁》便构成了一幅以歌颂领袖为幌子，而实质上是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美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就这样，一幅享誉海内外的名画《万岁》成了十足可怕的反动“毒草”，而它的作者哈琼文也成了“贩卖黑货”的反动画家，遭到了猛烈地批判。

◇ 因为江青“看不出是什么” 关山月被关进“牛棚”

《江山如此多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画家共同合作的巨幅壁画作

品。它是根据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诗意于1959年为人民大会堂绘制的。这幅壁画经过了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画家们一起探讨，综合各方意见才最后定稿。画面内容：近景是高山苍松，远景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云海茫茫，一轮红日高悬，辉煌灿烂，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位于画面的左上方。整幅画气魄宏伟，堪称垂世之作。

可是，江青对这幅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中国画却只说了一句“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来。由于江青的否定，作者的命运可想而知。傅抱石已经逝世，画家关山月自然难逃厄运。当时有一张题为《关山月的五支毒箭》的大字报将关山月的五幅画作称为五支毒箭：一是《崖梅》，因为倒枝，谐音便成“倒霉”，即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倒霉”也。而且据说那些枝丫线条中还隐藏着反动标语，其中有“介石”二字，其狰狞面目无法遁形。二是《东风》，三只燕子逆风而飞，“反骨毕露”。三是《快马加鞭未下鞍》，红军队伍登上崖头，前面不见有路，无疑是“诅咒红军已临绝境”。四是《李香君》，是“大唱亡国之音”。五是《山雨欲来》，画面有一解放军匆匆送信，“分明是向国民党通风报信”。

在“文革”那黑白颠倒的岁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关山月在广州美术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 被诬为“三家村”黑画家的黄胄

黄胄之所以被批判，其中一个重要的罪名是他送给邓拓的《百驴图》。罪名是：“不为革命驮公粮，只为反革命运黑货”，至于是什么“黑货”，却没有说清楚。黄胄画的骆驼肥壮而又豪迈，昂首阔步，还特意加了“任重道远”的标题，歌颂沙漠之舟的辛苦。而批判者却说是瘦骆驼，画得垂头丧气，“诬蔑了农村的大好形势”。他的《织网图》画的是南海渔妇为捕鱼而织网，是歌颂劳动人民的积极题材，也被扣上了“用三空诅咒三面红旗”。因为渔网有许多空眼，而网画得像一面旗，这不是说我们的红旗是空的么！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发表《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的文章。文章批判“黄胄的‘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是为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服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露了邓拓反革命黑帮，也揪出了他的走狗黄胄，消除了‘三家村’藏在我军美术工作队伍里的一条毒蛇。”该报还有一处统计：“以1964年出版的《黄胄作品选集》为例，全部二十幅画中，共计有61个，其中女人即占52个，蠢驴31头”“解放前他画的是毛驴和女人，现在还画毛驴和女人，翻来覆去都是些地主资产阶级的玩意。”因而“黄胄的艺术是极端腐朽的”，“在他（黄胄）画出的成千上万的‘毛驴’和‘女人’后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匕首和炸弹。”

黄胄因画毛驴而闻名，也因此而获罪。不管他怎样画毛驴，总是被赋予了“政治寓意”。正如他在197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所说的：“在美术界‘四人帮’首先拿民族绘画开刀，肆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胡说八道。那时候，棍子到处打，帽子满天飞。我画驴，毛驴画多了不行，跑不行，回头也不行。画回头小驴被加的罪名是‘留恋过去’，‘走回头路’。画一二头的罪名是‘单干’，画三头以上的罪名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落后’。画活蹦乱跳撒欢的小驴，往画面的右边跑不行，甚至前后跑都不行。因为按他们的说法，把画面按地图方向分，左西右东，上北下南，所以往右跑叫‘向往西方自由世界’，迎面跑叫‘恶狠狠地向社会主义扑来’，向后跑大概就是说‘要投靠苏修’，使你哭笑不得。于是，我就成了对党有刻骨仇恨的黑画家。”

◇ “恶毒攻击”江青不长头发的李苦禅

李苦禅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在“文革”中创作了一幅前后画有两条黑鱼、中间一条红鱼

在水中游动的作品，被“造反派”指责为“反动意图”十分明确。因为：“前面那两条黑鱼是要把红色的社会主义江山引向黑暗，后面那条黑鱼是表示红色社会主义江山除了改变颜色之外，没有出路。这是对党恶毒的咒骂！”李苦禅还有一幅画：画上有有一只石雕的小猫，旁边衬着一枚石头雕刻的印章。这幅画被指责为：“一只小猫，不去捉耗子，却虎视眈眈地盯着大印，就是妄想夺权嘛！”他的《荷花翠鸟图》，画了一只已死去的秃头小鸟，其用意是呼吁人们不要伤害鸟类，也被攻击为：“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借这幅黑画，为已被镇压的阶级敌人鸣冤叫屈！”他的《残荷图》还被加上了“恶毒攻击”的罪名。这幅作品画了八幅荷花，画面右侧的墨荷下，露有半截青石，在青石上站着一只翠鸟。“造反派”硬说那只鸟是暗讽“江青称霸”，最“恶毒”的是翠鸟头上缺了一撮毛，这是拿“敬爱”的江青同志不长头发的生理缺陷取笑。至于那八朵荷花，则是影射八个“样板戏”没人看……。

1974年，“四人帮”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江青在美术界的亲信王曼恬组织了一班秀才，炮制出一系列批判“黑画”的文章，还将一大叠“黑画”的照片带给毛泽东过目。一旦获得“恩准”，就立即在“两报一刊”上掀起批判高潮。这其中就有李苦禅的“黑画”。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翻看着这些照片，脸上时而流露出笑容，时而显出欣赏之意，甚至称赞画得不错。站在一旁的王曼恬提醒说：“主席，您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泽东眼睛忽然一亮，恍然说：“苦禅？噢，我记起来了。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长的信哩！”说道，他又侧过脸来问道：“那么现在他的工作安排得好吗？生活得怎么样啊？”王曼恬本想让毛泽东对李苦禅等画家的画说几句否定的话，以便回去组织对这些画家进行“批判”，不料毛泽东非但不批评，反倒关心李苦禅的工作和生活来了。王曼恬自讨没趣，只得丧气回来。

◇ 叶浅予的作品被揭露批判

叶浅予的许多作品在“文革”中被揭露批判。他后来回忆道：“最不可思议的是将我1953年画的那幅《中华民族大团结》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1962年创作的《秦川麦收》中那个农民说成是什么‘三仙姑’，《沈家门即景》那个渔民说成是什么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1962年我们和印度人在麦克马洪线打了一仗，我的那幅《印度献花舞》因为钤了一个《寄情》印章，便说我对敌人充满感情。如此牵强附会，难怪‘四人帮’在1975年把大批优美的国画，诬蔑为影射政治的‘黑画’，把中国画家打入十八层地狱。”

叶浅予被扣上的七条罪状是：丑化革命领袖；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劳动人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中央美院）；寄情敌人。他同时还戴上了三顶帽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历史反革命”。

“造反派”还揭发叶浅予说：“他画漫画攻击污蔑丑化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能放过他吗！他谩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能允许他吗！他写《冰糕诗》猖狂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我们能答应他吗！他与文化特务张大千勾结，企图把这样家伙弄回来再对我们进行统治，我们能答应吗！他对我们工农子弟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打击排挤，我们能答应他吗……”

从1968年到1975年，叶浅予坐了整整七年的监狱。

◇ “反动画家”石鲁

石鲁创作的《转战陕北》作品在“文革”中被诬蔑为“恶毒污蔑伟大领袖孤身一人，陷入绝境”；《东渡》的渡船画成烧焦的破船板，被指责为：“伟大舵手毛主席站在这条船上，能把革

命引向何方？”；《家家都在花丛中》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美梦”；《东海之滨》是在“盼望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东方欲晓》的枣树枝是“从尿缸得到的启示”……

陕西省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的筹备组，还调集西安大专院校几十名政治、文学、历史和美术界的学者批注石鲁的“黑画”，而且搞出了一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一份报送这个批判材料的请示报告中说：“1973年石鲁趁征集国画、书法出口之机，通过西安外贸部门和外贸部门的个别干部，将《猫虎镇宅图》、《文康载道》等一批反动字画相继抛出。这些反动字画中，有的托物寓意，借题发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的横涂乱抹，用‘野、怪、乱、黑’的画法，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有的狂热地宣扬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在《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中，石鲁作的一幅梅图及题写的咏梅诗（“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惟余风漫舞，还看春正高。”）被批注为：“倒梅者，倒霉也。石鲁此画攻击“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并不甘心倒霉，他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傲寒风，‘更放豪’，等待来日‘春正高’，这就是要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猫虎镇宅图》被批注道：“石鲁别有用心地在1971年冬将过去的‘猛虎镇宅’改为‘猫虎镇宅’，其罪恶目的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风流千载》被扣上了“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富贵于我如浮云，凡华粉色伤精神》被指责为：“石鲁对于文艺黑线赏赐的富贵荣华感恩戴德，现在又借孔老二之口指桑骂槐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新生事物是庸俗的荣华‘富贵’、大‘伤精神’的‘凡华粉色’，其反动立场何等鲜明。”

这样，作为曾担任“美协”西安分会主席、长安画派主将的石鲁，被打为“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反动权威”，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 丰子恺的“毒草”漫画

丰子恺的漫画、文章在“文革”中被曲解为“毒草”，受到批判。《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万家愁》漫画作品，一篇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幅大毒草作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向一切阶级敌人和自然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困难逐个克服，形势越来越好。就在这个时候，丰子恺抛出了《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笑万家愁》，并在画边题诗道：‘……俯仰天地间，遥闻悲叹声。声从远方来，尽是不平鸣。贫富何悬殊，苦乐太不均。大鱼啖小鱼，弱肉强者吞。婆娑世界中，火热与水深。……’在丰子恺眼里的我们的社会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弱肉强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极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能事，向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作反革命宣传，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的反华大合唱，并且起了帝、修、反所不能起的作用。对这幅大毒画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流毒，把它砸个稀巴烂，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丰子恺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画着一女郎用竹耙在打扫枫树落下来的红叶。很奇怪，坠下的红叶不多不少，正好是 three 片，被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春景如图画；临水各种桃花，一株当两株》是描写桃花在水中倒映的春景图，为配合形势，画中添上了“人民公社好”的标语。于是此画被说成人民公社如水中桃花般的虚幻，分明也是反对三面红旗。《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看剥莲蓬》一画，被说成鼓吹单干。因为剥莲蓬，织鸡笼，种自留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听我唱歌难上难》一书是一册幼儿读物，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旨在提高幼儿对正确与错误的识别能力。其中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说这是攻击毛泽东为绿太阳。其实，此画作于1957年，那时还没有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

于是作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丰子恺，自然也在劫难逃了。在一篇题为《剥开〈中国近代漫画鼻祖〉，反共老手丰子恺的画皮》的文章中指出：“长期披着‘中国近代漫画鼻祖’外衣的反共老手丰子恺，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三十年代’文艺元老，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杂家’，一个文艺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祖师爷’。长期以来，丰子恺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用他那枝毒笔炮制了大量毒文，毒诗，毒画，猖狂进行反党活动。在1928年直到1965年先后出版五集《护生画集》，打着‘慈悲’‘护生’的幌子极力贩卖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人性论’，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大肆宣传对蒋匪帮反动派放下武器，屈膝投降。丰子恺还无耻地鼓吹投靠美帝国主义。一副卑鄙的卖国贼的嘴脸。解放17年来，丰子恺更加变本加厉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咒骂三面红旗和党的文艺方针。竭力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

◇ 潘天寿被迫害含冤而死

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先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最先是由一首诗引起的。他在抗战时期写过一首《梦渡黄河》：“时艰有忆田横士，诗绝弥怀敕勒歌。为访燕幽屠狗辈，夜深风雪渡黄河。”有人说：“《梦渡黄河》，潘天寿借此诗寻访刺客，对我们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刻骨仇恨，实行阶级报复！”他的《访李易安故居》是1963年写的，“空古词臣泪，天教弱女乾。伤心忆王导，南渡仅衣冠。”也被说成是寄托其“亡国之恨”的代表作。《梅月图》被指责为是与毛主席词《咏梅》唱反调的。因为“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不同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首《过台湾》则被判为“直接抒发亡国之音，缅怀蒋家王朝的十分露骨的反革命诗篇”。此外，他的《秋夜》、《江山多娇》、《欲雪》、《残兰图》等也遭到了批判。1966年9月6日，他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关进“牛棚”，随后是游街批斗和身心折磨，二十天里体重减了17斤。

1968年5月，浙江美院和浙江其他单位的造反头头上北京送潘天寿的黑材料，诬称他是“国民党特别党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听了汇报，又看了他们带来的潘天寿《鹭鸶图》，怪声怪气地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姚文元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江青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同年9月15日，《浙江日报》发表一整版批判文章，通栏标题是“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文章说：“潘天寿何许人也？美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豢养的忠实走狗，国民党文化特务。就是他，曾经参加由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果夫、宋子文等大坏蛋当头目，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CC特务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是他，由国民党党棍，CC特务大头目张道藩亲自介绍参加国民党，被批准为特别党员……”9月17日，《浙江日报》再次加强力度，一下发了五篇批判文章，如《把文化特务潘天寿之流永远赶出美术舞台》、《“秃鹭”就是特务的化身》等等。“造反派”还反复抄家，将潘先生的所有作品和学术资料，乃至书画工具洗劫一空。他们把潘先生折磨成疾，不给予及时治疗，最终潘天寿含冤而死。

“文革”浩劫使我国一大批优秀画家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国的画坛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 《党史纵横》 2006年第2期

本期编辑：
丁凯文（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